

罗荣桓元帅的家风故事

□ 张嘉升

罗荣桓是新中国十大开国元帅之一，他一生恪尽职守，被誉为“政工巨匠”。在家庭生活中，身为党的高级干部的罗荣桓更是以身作则，处处率先垂范，带头树立良好家风。他不仅严格要求自己，不搞特殊化，同时也教育家人和身边工作人员要做老实人、干老实事，对党绝对忠诚，时刻为人民服务，抵制特权思想。

“永远做老实人”

罗荣桓自从投身革命，便将生死置之度外，更是从来没有想过将来飞黄腾达升官发财。1937年秋，罗荣桓奉命开赴抗日前线。临别前，他对新婚不久的妻子林月琴叮嘱道，要永远做老实人，忠诚于党的事业。“永远做老实人”不仅是罗荣桓对妻子的期望，更是自己坚守的信条。他时刻提醒自己是人民的公仆，应该为人民谋幸福，而不应该计较个人得失。

在炮火纷飞的革命岁月，罗荣桓一直四海为家，风餐露宿、曲肱而枕是家常便饭。由于环境的艰苦，加上没日没夜的工作，他最终积劳成疾，后被确诊为肾癌。1946年7月，党中央安排他到苏联就医。一年后，罗荣桓回到了哈尔滨，在组织的安排下，他住进了一幢楼房里。这是一处宽敞的上下三层楼的独立庭院。住在这样的房子里，罗荣桓感到太奢侈了，心里很不安，几次向有关部门提出另找一处朴素简单的房子住，但一直没有结果。有一天，他到谭政家去做客，见谭政住的是一处二层小楼，于是跟谭政说：“跟你们搭个邻居怎么样？你家住楼上，我们住楼下。欢迎吗？”谭政起初还以为罗荣桓在开玩笑，没想到几天以后，罗荣桓一家真的搬来了。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罗荣桓一家搬进了北京南池子18号。这处房子并不宽敞，要住上罗荣桓一家，再加上秘书、司机、警卫员等人，很不方便，但罗荣桓仍然自愿搬了进去。后来考虑到家里人口越来越多，房子实在过于拥挤，罗荣桓才于1954年举家搬到了东交民巷新8号，在那里一直住到逝世。

在其他许多事情上，罗荣桓也是处处为人表率，坚定做“老实人”。

按照当时规定，罗荣桓家里可以放专场电影，但他怕给别的同志添麻烦，因而坚决拒绝。有一次，罗荣桓不在家，放映队来家里给他的家人放了一场电影。他得知此事后，不仅严肃批评了身边的工作人员，而且还把总政文化部的负责人找来说：“我们为什么不能出去看电影呢？你们放什么好片子可以打电话通知我，我想看就去，不想看就算了，以后不准再到家里来放。”从此在罗荣桓的家里再也没有放过专场电影。有一次，有关部门通知罗荣桓到剧场去看河北梆子演出。他带着几个孩子去晚了，场内座位已经坐满了，他们绕着场子转了一圈也没找到空位。孩子们不高兴了，埋怨组织晚会的人没有安排好。罗荣桓却笑吟吟地说：“看不成就别看嘛！出来散散步不是也很好吗？”

有一天，罗荣桓在家养病，感觉精神好些，便去公园散散步。望着湖光山色，他心旷神怡，来了兴致，便让警卫员去租一条小船来划。恰巧这次警卫员没有带钱，司机老牟也没有带钱，罗荣桓自己更是从来不带钱的。于是，公园的保卫人员就要了一条船给他们划。罗荣桓一直记着这件事，几天后，他又一次专程到公园去还租船的钱。

罗荣桓对身边的工作人员十分亲切，总是喜欢和他们聊家常，相处得就如家人一般。

罗荣桓虽然担任重要领导职务，但身边只有一个秘书。他还会关照秘书的学习和休息，常常自己签收文件。政治学院的花工老张，每年都要到罗荣桓家里帮助整理花木。每次去，罗荣桓总会留他吃饭，林月琴则会给他送烟倒茶。老张每次回忆到这一幕，都感动地说：“这样的高级首长对我们工人如此亲切关怀，这在旧社会是做梦也想不到啊！”从解放战争时期就为罗荣桓开车的司机老牟说过，罗荣桓对同志不仅是关心，而且尊重，他认为革命工作没有高低贵贱之分。服务人员在工作中有缺点，罗荣桓也从不挑剔，更不会训斥。有一次，罗荣桓去人民大会堂开会，老牟以为会议要开很长时间，将罗荣桓送到后便出去参观了。孰料会议很快开完了，罗荣桓走出会场找不到车子，等了半个小时后，老牟才回来。正当老牟为自己的失职而深感不安时，罗荣桓只问他到哪里去了，参观得怎么样，别的什么也没有说。老牟十分感动，一直提醒自己以后不能再犯此类错误耽误首长的行程。

1962年，罗荣桓的病情已经十分严重了，但他总是默默忍受病痛折磨，尽量不麻烦医务人员，很少按响床头的电铃进行呼叫。一到晚间，他就让医务人员去休息。

罗荣桓就是这样一个心里装着大局、装着他人的人。

“要靠自己的本事吃饭”

罗荣桓是一名慈父，但从不溺爱孩子。他认为对高级干部的子女更应该严格要求，否则高级干部家庭的子女容易有优越感，这种优越感若不及时克服，就会发展成为一种特殊化的倾向，从而脱离群众。因此，罗荣桓经常叮嘱自己的子女：“革命干部子女不要脱离群众，不要有优越感，要和工农子弟打成一片。你们千万要有依赖爸爸、妈妈的思想，要靠自己的本事吃饭。”

罗荣桓十分注重对子女的教育。他的儿子罗东进是在1939年八路军一一五师从山西向山东挺进时出生的，还不足1岁的时候，就被挑夫从山西挑到山东。到了山东后，罗荣桓忙于战事，便将儿子送到老老家寄养，直到孩子5岁，山东抗日形势好转时，才将他接回身边。有一次，部队打了胜仗，罗东进捡了一个破防毒面具戴在头上，跑到街上又蹦又喊，把老家的孩子全都吓哭了。罗荣桓听闻此事后来到儿子面前，严肃批评他说：“你到老家乡里的时候，路都不会走，是老乡用高粱煎饼把你养大的，老乡待你像亲生儿女一样。可是你刚从老家乡里回来就忘了本！你知不知道什么叫群众纪律吗？……”说完，让年幼的罗东进进行自我反省。严厉的批评让罗东进认识到了这次行为的严重性，明白了父亲讲的道理，感到十分羞愧。事情过去几十年后，他说：“这件小事，给我留下了终身难忘的印象，它告诉我一条最普通也是最根本的道理：要爱护人民，永不忘本。”

罗东进和妹妹罗南下上小学时，由于学校离家远，平时兄妹俩都住校，只在星期六才坐公共汽车回家。有一次学校放学晚了，家里派车去接回了他俩。罗荣桓知道这件事后，把全家都召集到一块儿，严肃地说：“以后绝对不准用小车接送孩子。汽车是组织上给我工作用的，不是接送你们上学的，你们平时已经享受了不少你们不应当享受的待遇，如果再不自觉就不好了，那样会害了你们自己的。”他告诉工作人员：“让他们搭公共汽车也是个锻炼嘛！”后来有一次兄妹俩放学回家，没搭上公共汽车，就步行回家，天很晚了还没到家。家

里人有些着急了，担心孩子在路上出什么事。这时，两个孩子满头大汗、一身尘土地进了家门。罗荣桓一看就明白了，高兴地表扬了他们，说道：“好，好，你们做得很对，年轻人就应该时刻锻炼自己，不怕吃苦。生活上不搞特殊化，不要一味追求舒适的生活，贪图享受。今天你们搭不上车走着回来，不怕苦，不怕累，这种精神要发扬，要长久保存下去。”

1958年，正在读高中的罗东进报名参加修建十三陵水库的义务劳动。他表现积极，受到了上级的表扬。罗荣桓听闻后十分欣慰。回家看到儿子被磨破皮的肩膀，他勉励道：“这仅仅是开始。劳动人民的肩膀都已经磨成死茧了。你不要被艰苦吓倒，今后还要更积极地参加劳动。”在父亲的谆谆教导下，罗东进不断地追求上进，1959年考上了哈尔滨军事工程学院。在儿子离家前，罗荣桓语重心长地叮嘱他：“我同意你到军工去学习，是希望你在军事院校里接受严格的军事教育，使你在政治上更快地进步，将来为我国的国防建设做一点贡献，为人民做一点有益的事。而绝不是要你当什么官，出来摆威风。”还说，“现在我们的科学技术还很落后，落后就要挨打，你们要长志气，为国家搞出点成就来。”随后，他又拿出笔在纸上写了几行字，让罗东进带着并时刻铭记：学习专业与学习政治相结合。政治是确定方向，没有方向的航行，是会误入迷途的。紧密地联系同学，互相协作，达到一齐提高。警戒孤僻自大，也不要自卑无信心。遵守军事纪律，养成大无畏精神。在校期间，罗东进担任班里的党小组组长，平时活动多，学习压力又大，工作中难免出现急躁情绪。罗荣桓十分关心孩子的成长，抽空就会给他写信，时时提醒和告诫儿子：“不要只是用口号去要求别人，那样只会使自己脱离群众，使自己成为一个空头革命家，而应该以实际行动去影响别人。”罗东进牢记父亲的教诲，努力改掉了自己急躁的毛病。有一次假期，罗东进坐火车回家，主动将自己的座位让给了一位老大爷，而自己则在过道里站了一天一夜，结果回到家就病倒了。罗荣桓了解到事情的经过后，夸奖儿子说：“你做得对！能吃苦，这很好。我们像你这么大年纪，哪有火车坐呀。”

罗荣桓对女儿亦是严格要求，希望孩子能够自立自强。1954年罗荣桓的长女罗玉英由于身体不好，无法继续坚持学业，于是打算提前参加工作，这个想法得到了父亲的支持。但是，在分配工作时，罗荣桓并没有在城里的大机关为女儿谋求一个职位，而是要求她到工农群众中去，到艰苦的地方去锻炼。罗玉英明白父亲的良苦用心，她服从组织的分配到了郊区的一个农场工作。农场条件比较艰苦，交通也不方便，罗玉英要步行5公里后才能乘坐公共汽车回家。在农场，罗玉英从没有以高干子女的身份自居，而是与职工们一道工作、吃住和学习。她的思想经受了锻炼，还学到了许多书本上学不到的知识，身体状况也有了明显的改善。由于进步快，到农场后的第二年罗玉英就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对于女儿取得的成绩，罗荣桓感到十分欣慰，并鼓励她再接再厉。

多年以后，孩子们回忆起父亲的点滴教诲仍十分感激，罗东进说：“爸爸给我烙印最深的，还是他自己的模范行为。”罗荣桓的一言一行如春风化雨，无声地浸润着孩子们的成长。

罗荣桓几十年身体力行，留下的对党忠诚，严格要求子女，做老实人、办老实事的革命风范是我们党永不褪色的“传家宝”，是留给我们后人的巨大精神财富，直到今天仍然闪烁着光芒。

（摘自2020年第4期《党史纵览》）



井冈山革命博物馆里，陈列着一只棕色陶罐，里面装的是已经发黑结晶的食盐。

曾有一对爷孙在陶罐前驻足。“这罐盐，是咱们家的传家宝。”爷爷李球德指着盐罐，骄傲地说，“你老爷爷当年留着这罐盐舍不得吃，在咱们家后山埋着。”

“爷爷，盐有什么舍不得吃的？”6岁的孙子问。

李球德讲起这罐盐背后的故事。

1927年，为了将红军困在山上，敌人在井冈山各个要道拦路设卡，企图阻断井冈山与外界的物质交换，尤其是食盐和药品。红军和群众同甘共苦，当时的名言是“有盐同咸，无盐同淡”。次年冬，红军打上蒙缴获食盐，分给村民。李球德的爷爷李尚发分到食盐，不舍得吃，他想留着给红军。在井冈山失守前，为了防止这罐宝贵的盐落到敌人手里，他悄悄将盐埋在自家屋子后面的树洞里。

这罐盐在树洞里，一藏就是31年。

“直到1959年建博物馆时，你老爷爷才跑到后山把盐挖出来，连同缝在我爸爸帽子里红军发的那枚银元，一起捐

写在布上 记在心间

□ 王 丹

“牺牲个人、严守秘密、阶级斗争、努力革命、服从党纪、永不叛党”。

这些文字，写在井冈山革命博物馆展柜里一件已经泛黄的布片上，是江西永新县才丰乡北田村的普通农民贺页朵当年入党时亲笔写下的。誓词左右两边画着两个五角星，五个角内对应写着“中国共产党”5个字。上方是中国共产党的英文缩写“C.C.P.”，右边沿落款：“中国共产党员贺页朵”“地点北田村”。

贺页朵，1886年出生于北田村的一个贫苦农民家庭。1927年，井冈山开展了轰轰烈烈的农民运动。此时，已经41岁的贺页朵满腔热情、义无反顾地投身于这场革命运动，并担任了乡农协会副主席。

井冈山地区群峰连绵，地形复杂，交通运输和通信联络极为不便。为了方便与上级党组织取得联系，贺页朵把自己家的榨油坊作为红军的秘密联络点，收集和传递情报、运送伤病员、转运食盐。他还多次

参加攻打永新和吉安的战斗。由于表现出色，永新县东南特区党委决定吸收他入党。

入党宣誓是在贺页朵家的榨油坊进行的。昏暗的桐油灯光下，他在一块布料上写下了庄严的入党誓词。

“他识字不多，在这张入党宣誓书里，24个字中有多个别字，但仍能让人感受到他内心深处的忠诚和信念，具有强烈的震撼力。”井冈山革命博物馆讲解员说。

1934年红军主力长征后，贺页朵因身负重伤留在当地坚持斗争。在以后的漫长岁月里，他冒着生命危险，将入党誓词藏在榨油坊的屋檐下保存下来。

直到1951年，中央派慰问团到南方老革命根据地慰问时，贺页朵才将这份珍贵的入党誓词亲手交给慰问团负责人，后转存至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博物馆，井冈山革命博物馆复制了这份珍贵的革命文物。（摘自2021年1月22日《人民日报》）

我党早期领导建立的

□ 乔 东

第一个产业工会

长辛店工人运动是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工人运动相结合的起点与典范，在中国马克思主义传播史、中国共产党创建史、中国工人运动史上，都占有十分重要而特殊的地位。长辛店不仅留下了李大钊、毛泽东、邓中夏等中国共产党早期领导人的革命足迹，也孕育出史文彬、王俊、杨宝昆等中国最早的工人党员代表，是中国共产党早期组织领导建立的第一个产业工会所在地。

“自治能力吾人亦瞠乎其后”。俄国十月革命后，中国知识分子开始意识到工人阶级蕴藏的巨大力量。长辛店作为北京铁路工人的聚集地，是知识分子的团结对象。1918年夏，华法教育学会的蔡元培、李石曾等在长辛店设立留法勤工俭学预备班。1918年冬和1919年3月，时任湖南留法勤工俭学运动负责人之一的毛泽东，曾两度来到此处，看望湖南籍学员。他特别嘱咐学员，要帮助启发工人的救国心。

5月4日，五四爱国运动爆发。北京学生举行示威游行时，就有长辛店留法预备班的学员和铁路工厂的艺员养成所的学员，以及车务见习所的学员参加。他们回到长辛店后，立即在广大工人中进行爱国宣传，组织“救国十人团”，开展斗争。当时北京《益世报》赞誉长辛店工人“不但爱国之心之纯粹、真切为我学

界所不及，即自治能力吾人亦瞠乎其后”。5月7日，长辛店铁路机厂铆工场铁匠史文彬，带领100多名工人，上街示威游行，组织罢工，开展反帝爱国斗争。这次罢工尽管规模不大，但它是中国工人阶级的第一次政治性罢工，因此被视为中国工人阶级登上历史舞台的预演。

“北方劳动界的一颗明星”。北京共产党早期组织通过创办长辛店劳动补习学校，把工人紧密团结起来，不断教育和启发了工人的阶级觉悟。但是，邓中夏说：“这个学校（即长辛店劳动补习学校）当然只是我们党在此地工作的入手方法，借此以接近群众，目的在于组织工会。”因此，由李大钊、邓中夏等指导，史文彬、王俊等工人带头，联络各处工人，开始筹建工会组织。

1921年5月1日，长辛店1000多名工人在娘娘宫召开庆祝“五一”国际劳动节大会，天津、保定等地的工人代表也专程前来参加。会上决定成立“长辛店铁路工会”。会后，工人们举行了游行示威，散发传单，以及《五一一日》《工人的胜利》两本小册子，高呼“增长工资”“缩短工时”“工会是最好的法子”等口号。当时出版的《共产党》月刊对长辛店工会评价道：“五月间，他们组织了一个工会，……他们的努力，实可令人佩服，不愧乎

北方劳动界的一颗明星。”

1921年5月5日，长辛店铁路工会正式成立。各地工人纷纷到长辛店参观访问。“大家不觉油然而生羡慕之心，在当时工人们仿佛觉得长辛店是工人的‘天国’”。他们将长辛店工会组织当作样板，纷纷在各地建立自己的工会组织。这是中国工人阶级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党领导建立的第一个产业工会。它的成立对于北京共产党早期组织积累工作经验，推动工人运动的深入，以及中国共产党的创建都具有重要意义。

“中国工人运动还是从长辛店铁路工厂开始的”。1921年7月，中共一大在上海召开。大会通过的《中国共产党第一个决议》，明确提出：“本党的基本任务是成立产业工会。……工人学校应逐渐变成工人政党的中心机构”。从党的第一个决议可以看出，长辛店工人运动对党的创建和发展的重要意义。中国共产党创建伊始，主要处于秘密状态，为了公开领导工人运动，1921年8月，中共中央组建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并指示要在工人群体中发展党员。长辛店是北京地区开展工人运动最重要的实践基地，经邓中夏等人努力，先后吸收了史文彬、王俊、杨宝昆等工人入党。

北京党组织通过这些骨干力量，开始对长

辛店铁路工会进行整顿。1921年10月20日，长辛店机器厂、修车厂、工务厂的工会代表召开联席会议，决定将长辛店铁路工会改组为“京汉铁路长辛店工人俱乐部”。1922年4月9日，长辛店工人俱乐部正式成立。长辛店工人俱乐部的建立具有很强的示范效应。“在中国职工运动的初期，‘工人俱乐部’这一名称，相习成风，成为当时全国各地（广州除外）工会通用的名称”。在长辛店工人俱乐部成立之后，一批由共产党人领导的、方向明确、组织坚强的产业工会和地区工会组织，如雨后春笋，破土而出，茁壮成长，为即将到来的全国第一次工人运动高潮，作了组织上的准备。1956年3月6日，毛泽东在听取铁道部长滕代远汇报铁路工作时指出，中国工人运动还是从长辛店铁路工厂开始的。

（摘自2020年7月20日《北京日报》）

